

国外税收遵从理论模型研究综述

金 鹏

(宁波大学商学院 宁波 315211)

【摘要】 税收遵从一直是国外税收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对国外的几种税收遵从理论模型进行了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税收遵从 A-S模型 期望理论

税收遵从也称纳税人遵从,是指对纳税人依法照章纳税状况的评述,其理想状态是:纳税人按要求进行税务登记;及时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要求报告相关的涉税信息;及时、足额地缴纳或代扣代缴税款(王锐,2003)。与此理想状态相背离的为税收不遵从。税收遵从可划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自我服务性遵从、习惯性遵从、忠诚性遵从、代理性遵从、懒惰性遵从;税收不遵从可划分为程序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懒惰性不遵从、自私性不遵从、象征性不遵从、社会性不遵从、经纪人不遵从、习惯性不遵从。通常税收遵从的相关研究以自私性不遵从为主要研究对象,即通常所说的“逃税”。对税收遵从的研究起源于美国,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税收遵从的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对国外的几种税收遵从理论模型进行了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

最早研究逃税的理论模型是由Allingham和Sandmo(1972)建立的,研究的重点是高税率是否会导致更高或更低程度的遵从。Allingham和Sandmo建立的模型被称为A-S模型,这里纳税人逃税的目的是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为此,纳税人一方面通过隐瞒收入以增大效用,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由于被处罚而引起的效用损失,因此纳税人应合理地申报收入以达到预期效用最大化。其假设条件包括:①纳税人最大化基数效用函数,而且基数效用函数是收入的单一函数;②纳税人的边际效用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的,而且是递减的,因而纳税人是风险厌恶者,其实际收入是外生变量,其逃税不支付成本,而且不影响劳动供给决策;③纳税人的行为符合冯·诺曼和摩根斯坦关于不确定情况下的行为规律;④采用比例税制;⑤稽查概率是常数,罚款的数额为应税收入与申报收入的差额,罚款率大于税率;⑥稽查不会给纳税人带来附加成本,稽查后总能得出纳税人的真实收入。A-S模型分析了税率、稽查概率和罚款率与逃税额的关系,可以得出:逃税额与罚款率、稽查概率负相关,而与税率的关系不确定。税务征管机构可以通过提高稽查概率与罚款率来减少逃税行为,理论上只要罚款率足够高,厌恶风险的纳税人的期望效用就会小于零,

则其不会逃税,但实际上出于破产约束或公平的考虑,罚款率不可能太高。由于A-S模型将逃税视为更具有风险的资产纳入纳税人原有的资产组合,因此该模型也被称为组合模型。

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与方向,但也存在若干缺点。继A-S模型之后的许多模型放宽了一些假设条件或作了部分修改,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关逃税研究的组合模型框架。Yitzaki(1974)对A-S模型作了重要改进,他认为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税收罚款都是以逃税额为依据的,而A-S模型则是以少申报的收入额为惩罚依据,并不符合现实情况。Yitzaki对A-S模型作了修改,将逃税额作为罚款的依据,从而得出A-S-Y模型,并认为逃税额与税率负相关。在A-S-Y模型中,收入是外生给定的。对此模型进行扩展,考虑劳动供给和逃税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收入变为内生给定的(Pencavel,1979;Cowell,1981;Sandmo,1981),从而得到内生收入逃税模型。

二、考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相互作用的税收遵从模型

A-S-Y模型的一个缺点是假定审计概率不变,但事实上审计概率取决于申报的收入。因此,许多后来的研究者在模型中将审计概率设为申报收入的函数。这些模型不仅可以预测税收遵从程度,也可以确定税务机关的最优审计战略。

这些模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前宣布其审计规则,这类模型属于委托代理模型;第二类假定税务机关不宣布其审计规则,而是在所有申报完成后再确定对哪些纳税人进行审计,这类模型使用经典的进化博弈理论的均衡概念,特别是序贯均衡。

Reinganum和Wilde(1985)提出的模型属于第一类模型,其假定真实收入连续分布,征税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每个纳税人申报应税收入,支付相应的税款;在第二个阶段,税务机关对一部分纳税人进行审计,从而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税率和惩罚函数都为线性的,纳税人为风险中性的,税务机关的目标是实现期望收入(税收和罚款之和减去审计成本)的最大化。税务机关在最大化期望收入的过程中遵循“临界点规则”,临界点规则的一个特点是它是申报收入的非增函

数。后来,还有一些类似的模型改变了某些假定,但所得出的结论与Reinganum和Wilde(1985)提出的模型的结论是相似的。

第二类模型认为当税务机关不宣布其审计规则时,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交互形式是序贯博弈。Reinganum和Wilde(1986)的模型是较早提出的税收遵从和审计的博弈模型之一,他们认为纳税人无法确定税务机关是否遵循其预先宣布的审计规则。模型假定只要能获取更多利益,纳税人就会选择逃税,税收和罚款函数都是线性的,纳税人拥有其收入水平等私人信息,而税务机关仅知道纳税人收入的概率分布。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当纳税人为同一类别(指具有相同的可观察特征的一组纳税人)时,税务机关的审计策略是:对于申报收入数额较小的纳税人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名义税率是比例税率,而实际税率是累退税率。

Reinganum和Wilde(1986)提出的模型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博弈论也成为主要的税收遵从理论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后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模型进行了扩展和修正。Graetz等(1986)的模型假定纳税人的真实应税收入分为高和低两种类型,这有利于分析的简化,成为后来的许多模型采用的一种标准方法。Beck和Jung(1989)分析了当税率、税负和税务机关的稽查成本不确定时,纳税人对均衡的影响。Sansing(1993)分析了逃税预测系统提供的信息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策略的影响,发现逃税预测信息可能会增加纳税人逃税概率和审计成本。Erard和Feinstein(1994)在模型中引入了不为利益所驱动的诚实纳税人,分析了其对均衡的影响。该模型的创新之处是不仅强调了纳税人申报决策的经济动机,而且还考虑了纳税人的道德观念,借鉴了税收遵从的社会学、心理学观点。Rhoades(1999)的模型中的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收入不仅仅是单一的净收入,而是由多个项目组成。分析发现,税务机关可以利用多个项目真实值的相关性获得更大的收益。Zeng(2002)在模型中考虑了财务报告的作用,发现税务机关更愿意审计高会计收入、低应税收入的纳税人。Feltham(2002)的模型考虑了纳税人预付税额决策的影响。

三、基于期望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

在预期效用模型、委托代理模型等绝大多数模型中,纳税人被假定为“经济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的色彩。但现实中,纳税人并非是完全的“经济人”,很多纳税人具有道德感和羞耻感,纳税人无法准确获知审计概率。有一些模型考虑了这些问题。Kim(2005)提出的模型考虑了纳税人的无知性,假定纳税人不知道真实的审计概率,同时还考虑了道德感,结果发现当降低纳税人的不确定程度而需要支付成本时,存在某一不为零的最优不确定程度。Snow和Warren(2005)的模型发现审计概率的不确定会提高不确定规避型纳税人的遵从程度,但会降低不确定爱好型纳税人的遵从程度。

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模型得出的结论不能完全解释税收遵从行为。大多数国家在税收方面的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都很低,如果将现实中真实的稽查概率和罚款率代入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大多数纳税

人都会逃税。但是现实中的税收遵从水平远远高于理论推导的水平,甚至在大多数纳税人选择逃税的情况下,大量的税收不遵从行为都是很难看到的。

实证研究发现,纳税人的预缴税额小于实际应纳税额时的税收遵从水平低于预缴税额大于实际应纳税额时的税收遵从水平(Clotfelter,1983;Chang和Schultz,1990)。而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则认为税款预缴不会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

由于基于“经济人”假定的决策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国外学者近些年开始尝试用新的决策理论来研究税收遵从问题,期望理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期望理论由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年提出,Kahneman和Tversky(1992)把累积函数引入期望理论,形成了累积期望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表现为相对于高概率收益的风险厌恶和相对于高概率损失的风险寻求,以及相对于低概率收益的风险寻求和相对于低概率损失的风险厌恶,这反映为期望理论的价值函数概念,其形状为S型,在参考水平之上的收益区域的曲线是凹的,在参考水平之下的损失区域的曲线是凸的。期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权重函数,与预期效用理论以客观概率为权重不同,期望理论中的决策权重是客观概率的函数。期望理论下的权重函数是单调递增、非线性的,并且小概率的权重值大于概率值,而大概率权重值则小于概率值。

基于期望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为什么现实的税收遵从水平远远高于预期效用理论所预测的水平,Alm等(1992)指出可以用期望理论解释纳税行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由于高估了稽查概率,在这种低概率损失面前,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选择遵从。但遗憾的是,该研究没有对这种想法进行形式化描述。

Dhami和Ial-Nowaihi(2004)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们在基于期望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中使用了Prelec(1998)提出的权重函数形式模型,并与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基于期望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从而能较好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纳税的问题。对于“预缴现象”,可以用期望理论的“参考点”思想来解释(Robben等,1990),纳税人在面临高于参考点的收益时将会表现为遵从,而面临低于参考点的损失时则会表现为不遵从。White等(1993)通过实验验证了期望理论的这一预测,研究表明处于欠缴位置的纳税人比处于退税位置的纳税人更倾向于不遵从。Elffers和Hessing(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意提高所得税的预缴额度会加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倾向。Yaniv(1999)将期望理论运用到一个简单的逃税模型中,探讨了税款预缴制度对税收遵从行为的激励作用。他的理论研究结果与美国的实际情况一致,税款预缴制度会提高税收遵从水平,但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略有不同的是,该研究认为有意提高税款预缴额度并不能完全消除税收不遵从行为。

主要参考文献

麻勇爱.纳税人遵从理论及其借鉴意义.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2;2